



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的 提炼、阐释与转化*

张冬宁

摘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遗产价值可划分为核心遗产价值与衍生遗产价值,其中核心部分由年代、历史、科技、艺术等要素组成,对衍生部分起决定性作用,它产生于遗址本身,历经岁月打磨而成,其存在的前提是人对遗址的主观认知;衍生遗产价值则包含纪念、经济、教育和游憩等要素,是遗址与公园共同作用于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客观影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核心遗产价值从遗址到公众的传递,其传递流程由提炼、阐释与转化三部分构成:首先,通过建立科学的标准对核心遗产价值进行提炼,寻找到这些关键要素的内在联系并进行整合,进而锁定其本源意象,为后续阐释奠定基础;之后,按照尊重与平衡的原则对提炼结果进行解构,从“时-空-人”三个维度进行通俗的解释和适当的发挥,将专业的研究内容转译为共享的文化知识;最终,在充分考虑政府、居民、游客不同诉求的前提下,通过原生与次生路径将阐释成果重塑为具有文明重现性的空间表达和具有人址链接性的文化体验。

关键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产价值体系;价值传递流程;本源意象

中图分类号:K878;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6)02-0067-07

大遗址作为规模宏大且最具代表性的一类文化遗产,不仅见证了古代先民不断劳动创造和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更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核心文物资源。而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遗址保护与城乡建设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为解决这一难题,自20世纪80年代起,部分地方政府就参照圆明园遗址公园陆续建成了一批简单的“遗址+公园”。随着2005年《“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颁布实施,我国的大遗址保护工作逐渐拉开帷幕,在总体目标中正式提出要探索大遗址保护展示的科学路径,建设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2009年,《关于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良渚共识》的公

布,标志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一主体的正式确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研究阐释、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文化空间,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大遗址保护利用新模式。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已走过10多年的发展历程,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先后评定五批65座遗址公园,分布在21个省(区、市)。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还存在许多问题,如项目巨大投入与客流冷热不均的落差,遗址多样性与千园一面的冲突,遗产的真实完整性与园区的教育娱乐性之间的矛盾,考古研究的学术严谨性与公众预期的趣味故事性之间的错位,等等。解决

收稿日期:2025-09-04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河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的提炼、阐释与转化研究”(2021BZZX007)。

作者简介:张冬宁,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河南郑州 451464),主要从事文化遗产相关研究。

以上问题需要回归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初心——既是为了保护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更是为了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美好文化生活的期盼与向往。唯有如此，才能认清解决当前诸多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沉睡于厚土之下的大遗址“活”起来，用何种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通俗地讲，就是我们究竟要在遗址公园内向公众展示什么以及如何展示。这就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的提炼、阐释与转化。

当前关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研究虽取得了许多进展^①，但仍存在一些可供深入研究的方面。尤其是关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价值的研究，多停留在宏观描述和定性分析层面，对遗址公园的价值（尤其是遗产价值）体系的构成缺乏全面分析，缺少对其传递过程（如提炼、阐释与转化）的整体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将尝试厘清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的构成与内在逻辑，建立清晰的提炼标准，划定合理的阐释原则，提供科学的转化路径，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一、核心遗产价值的生成与传递逻辑

在展开进一步研究之前，有必要先厘清核心遗产价值的概念及其蕴含的内在逻辑。

（一）核心遗产价值的生成

从字面来看，“核心遗产价值”是“遗产价值”中最重要和关键的部分，而“遗产价值”又可拆分为“遗产”和“价值”。

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遗产是地球自然演进和人类发展过程中留传下来的、被人类这个主体认为有价值保存的客观存在”^②。它是一种物质或非物质的遗存，后人可以根据主流的价值观有目的、有选择地予以继承或传承^③。作为一种人为创制的事物或改造自然的见证，“遗产”既包括物质实体，也涵盖非物质形态，往往聚焦于事物的“被选择性”“珍稀性”和“代际性”。

在汉语语境下，“价值”一词源于经济领域的等价交换概念，《说文解字》云：“价，物直也。”^④

直即值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值，持也。……引伸为当也。凡彼此相遇、相当曰值。亦持之意也。史、汉多用直为之。姚察云：‘古字例以直为值。’是也。价值亦是相当意。”^⑤随着近代西方“value（价值）”概念的传入，其“珍贵”和“值得重视且加以保护”的意思逐渐融入汉语“价值”的文义当中。“价值”一词遂转向抽象意义的建构，包含超越物质的精神认同与集体记忆的载体功能。在文化遗产学中，“价值”指代客体对象对人类社会的意义与效用，其内涵由多维认知框架交织而成。

无论是“遗产”还是“价值”，都与“人”息息相关。事物在被创制的一瞬间就具有了天然的物质或精神属性，但能被冠以“遗产”之名的事物区别于一般事物的关键，在于其拥有一种被“人”所选择、判定与传承的“遗产价值”。早在19世纪下半叶，阿洛伊斯·李格尔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围绕文物的价值与意义构建起一套复杂的价值认知体系，其中最关键的两大要素，可归纳为“新物价值”与“年代价值”^⑥，前者指代人们创造事物时所赋予的价值；后者则代表了文物所经历的漫长岁月，蕴含了“古老”这一被世人普遍认可的时间价值。这种以“新物”与“年代”区分“遗产价值”的研究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文化遗产的一些重要特征，例如“历史代表性”“科技发展性”“艺术表达性”“情感纪念性”等，都源于前人劳动创造的定格瞬间与后人普遍赞同的价值认知。

对于遗产来说，最重要的价值源于自身古老的年代属性。这种饱经时光洗礼且无法伪造的价值造就了遗产，同时也是历史、科技、艺术等价值要素得以成立的基础。此外，年代属性还反映在遗产经历了漫长岁月后所独有的年代侵蚀感，这会使其具有不同于新物的特殊风貌。由于人类与生俱来的怀旧情感，这种显示过去时光特征的往昔之物，足以勾起人们对历史的追忆和怀念，使得遗产孕育出所谓的“纪念意义”。由于这种强烈的情感链接，人们才会对遗址产生主动的探索意向，从而产生接触、研究、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的动机。

结合以上理论研究与既有成果^⑦，笔者认为“遗产价值”可大致划分为“核心遗产价值”与

“衍生遗产价值”，其中核心遗产价值是整个遗产价值体系的基础，具体由年代、历史、科技、艺术等要素组成，是一种源于遗产本身且由岁月打磨而形成的价值，其成立的前提来自人对遗产的认可与判断；衍生遗产价值则包含纪念、经济、教育和游憩等要素，是一种建立在遗产之上与外部环境协同演化而成的价值，最终作用于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多个维度。核心价值源于遗产自身，是人对遗产的主观认知；衍生价值则脱胎于遗产及其周边环境，代表了遗产对人的客观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核心层面的年代价值要素和衍生层面的纪念价值要素最为关键，前者是历史、科技、艺术等确立的基础，决定了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后者则是维系经济、教育、游憩等成立的纽带，引发人与遗址的情感共鸣。鉴于年代是一切价值要素得以建立的基石，故核心遗产价值也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衍生遗产价值的生成轨迹。

从本质上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依托大遗址形成的一种保护与利用模式，所有价值均依附于遗址本身而存在。故其核心遗产价值可归纳为从遗址本体延伸出来并得到社会广泛认同的年代归属、历史见证、艺术典范与科技成就。现有实践表明，遗址公园基于以上价值对外部社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集中体现为增强公众家国认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坚定文化自信以及营造公共休闲空间等方面。鉴于此，可将衍生遗产价值界定为遗址本体与园区共生互动下所形成的情感链接、经济效益、教育功能与游憩体验。上述八大价值要素共同构成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遗产价值体系。

（二）核心遗产价值的传递逻辑

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初心是为了搭建起一座连接古代遗址与公众的桥梁，让遗址的关键特征被公众感知、理解与认同。遗址公园的终极目标从来都不是旅游开发，纪念、经济、教育、游憩等功能的实现都是建立于核心遗产价值的成功传递之上。

从公共考古学的视角来看，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的关键在于重构、阐释和展示^⑧，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初衷亦是让考古研究走出封闭的“象牙塔”，让遗址在与公众的互动中完

成由考古成果向历史文化资源的转化^⑨。故而核心遗产价值的传递也是一个从历史中“认知”，通过当代话语的“表达”，最终在社会生活中实现“活化”的动态过程，因此其传递过程可划分为提炼、阐释与转化三个阶段：第一步是对核心遗产价值的提炼，即通过梳理遗址公园的多重核心价值要素，按照科学的评定标准，寻找其内在联系并进行整合，进而锁定自身的本源意象，为之后的阐释指明方向；第二步是提炼结果的阐释，即对提炼得出的本源意象从“时-空-人”三个维度进行通俗的解释和适当的发挥，讲清楚其前因后果，将专业的研究成果转译为共享的文化知识；第三步是阐释内容的转化，利用多重路径将阐释成果重塑为具有文明重现性的空间表达和具有人址链接性的文化体验。

可以说，提炼是对核心价值的高度概括，阐释是价值传递的关键步骤，转化是价值表达的最终形态。三者层层递进，关联紧密，形成动态反馈的有机整体：遗址贡献了真实的核心遗产价值，提炼对价值要素信息进行了概括凝练，阐释则赋予了转化的具体内容，这种转化从物理与精神双重层面为公众提供深度体验，以上共同构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层层传递的内在逻辑。

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的提炼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传递的第一步，就是要对遗址的多重核心价值要素进行提炼，进而锁定自身的本源意象。该意象根植于遗址的时代背景、历史进程、艺术成就与科技水平等重要信息，是高度凝练的、能够集中体现遗址之于中华文明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其直接影响着人们在接触遗址后，在脑海中形成的关键记忆与第一印象。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于本源意象的接受本来就易受个体差异的影响，如果缺乏科学权威的界定，更容易出现千人千面的感知偏差。因此，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多学科的交叉视野，更需要建立起合理的评定标准，判定哪些核心遗产价值可归为遗址的突出

贡献,从而按照其内在逻辑进行整合,凝练出最具代表性和独特性的本源意象。

如上所述,早在设计之初,遗址公园的一大建设目标就是通过大遗址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传承融合的文明脉络,故其本源意象在彰显遗址对于中华文明的突出贡献的同时,也要围绕展示中华文明根脉延伸展开。同时,大遗址和遗址公园本身还具有以下可供参照的突出特征:第一,遗址公园所依托的大遗址往往以长时段的延续而闻名,这种延续性不仅展现了遗址自身的悠久历史,更凸显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第二,无论是史前时期见证不同区域文化碰撞交流的古代聚落,还是不同历史时期作为多民族文化交汇之地的大型都城,这些大遗址都反映出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特性,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第三,遗址出土的大量实物遗存见证了中华文明在漫长历史中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这些成就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的价值观念、审美传统与科学理念,更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的东方典范。第四,遗址公园作为当地居民与外地游客感知历史、亲近自然的游憩场所,承载着深厚的纪念意义,能充分满足公众对于归属感的认同需求,帮助大家找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样灵魂三问的答案,增强对文化遗产地的理解、尊重和认可,在内心自发生成对遗址保护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据此,笔者认为在提炼过程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核心遗产价值应满足以下一项或多项标准才能被视为其本源意象。具体说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本源意象的评定应遵循以下五个标准:第一,能够彰显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昭示自身在中华文明赓续中占据的重要地位。第二,能够凸显中华文化的多元包容特征,呈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第三,能够代表古代中国在思想、艺术、科技等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与经典范例。第四,能够体现遗址、自然、人三者的和谐共生。第五,能够引发公众的精神共鸣,使遗址与公众之间建立起深层次的情感链接。第六,能够见证中国古代的历史走向与重大事件发生的关键节点。

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的阐释原则与构成

阐释的本质是构建知识重塑的双向通道:既要遵循考古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又要运用传播学的认知适配原理,通过学科交叉创新、叙事文本重构等策略,对提炼出的本源意象进行转译解读。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学术通俗化,而是以真实性为锚点,以趣味性为杠杆,共同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从“专业话语”到“共享知识”的范式转型。

(一)阐释原则:尊重与平衡

1. 尊重文博机构和专业学者的权威性,提升阐释的公信力

如前所述,遗址公园的核心遗产价值建立在人的主观认知之上,其中最重要的年代要素直接源于考古工作者和研究人员长期积累得出的结论。这些一手资料不仅构成了阐释的重要依据,而且为揭示遗址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艺术表达与思想观念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专业视角。同时,专业机构和学者的观点在公众认知中还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这种权威性能够有效提升阐释的公信力,增强公众对阐释内容的认可度。因此,在阐释过程中,尊重文博机构和专业学者的权威性不仅是对他们专业贡献的肯定,也是进一步巩固自身科学性和说服力的关键。

2. 平衡学术严谨性与科普趣味性之间的关系,推动知识的跨界传递

在对核心遗产价值进行阐释的过程中,要深入理解学术严谨性与科普趣味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学术严谨性是阐释得以成立的根基,要求信息传递必须基于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视野,确保史实准确、逻辑严密;科普趣味性则是加速传播的催化剂,通过公众可理解的语言、可感知的形式,将抽象且单调的本源意象重塑为具象且有趣的知识。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学术为体,科普为用”的螺旋结构。

(二)阐释构成:“时-空-人”的三维叙事网络

从内在构成来看,阐释是对提炼得出的本源意象在时间、空间、人三个维度的发展延伸。

这种阐释可以形成一个立体的叙事网络,既能观照到以时间为纵轴的遗址演变和历史事件,也能投射出以空间为横轴的规划布局和功能结构,还能反映出以人为竖轴的社会政治体制(治理观)、行为处事准则(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宇宙观)。

时间维度重在阐明遗址的历史演变过程,不仅要梳理遗址兴衰的时间线,更要揭示出自身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还要对其承载的文化内涵、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进行拓展解读。空间维度则既要兼顾传统的微观描述,讲清楚遗址的规模、布局与功能,又要结合历史地理学与环境考古学等宏观视野,观察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贸易往来与民族融合。人的维度则涵盖遗址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联,既能反映出遗址对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又能折射出古代治理观、价值观和宇宙观等对后世精神世界的深远影响。通过时、空、人三个维度的阐释,可以对本源意象进行多方面的延展与深入浅出的转译,从而为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的转化提供丰富的内容支撑。

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的转化前提与路径

在最终的转化阶段,需要实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传递的由虚入实。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充分考虑不同主体的诉求。

(一)转化前提:观照不同参与主体的差异化诉求

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三大主体中,当地政府是遗址公园的建设者与管理者,肩负着平衡巨大投入成本与良好社会效益的重要职责;本地居民一方面是遗址公园的直接受益者,另一方面也要面对周边环境不可逆的改变;外地游客在扮演外来消费者角色的同时,也是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以上三者的诉求既有重叠也有差异,直接影响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的转化方向。

1. 当地政府的宏观层面诉求

从当地政府的视角来看,其作为遗址公园的建设主体,在付出了大量的资金成本与行政

成本后,必然会从辖区管理者的角度提出以下宏观层面的诉求:一是加强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通过遗址公园的形式守护自身的城市文脉;二是促进经济发展,遗址公园的投入体量巨大,唯有带动区域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方能实现投入产出的正向循环;三是提升城市形象,通过遗址公园展示城市的历史底蕴和独特魅力,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形象;四是有效改善民生,关注遗址公园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确保二者和谐共生。可以说,当地政府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的转化诉求,既体现在注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又聚焦于遗址的经济价值、城市形象、民生改善等方面,力求进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2. 社区居民的中观层面诉求

在遗址公园周边土生土长的居民是一个扎根于当地的社区群体,他们对留存于这片土地的遗址怀有深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仅希望遗址能够得到妥善保护,避免因过度开发而破坏其原貌和生态环境,更期待通过遗址的合理利用为当地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带动社区发展。因此,社区群体期盼在保护遗址的同时,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

3. 外地游客的微观层面诉求

作为能为遗址公园带来主要经济收益的群体,外地游客对核心遗产价值转化的诉求多表现出一种围绕个人的具象化需求:一是渴望经历难忘的文化体验,通过别具匠心的展示方式认知理解遗址所蕴含的厚重历史,在旅途结束后可以与亲朋好友分享此次游览的心得体会;二是期待在遗址公园内感受独特的文化氛围,通过参与传统节日庆典、观看民俗表演或品尝地方美食等方式,感受当地文化的独特魅力;三是关注园区的旅游服务设施是否健全,希望当地能够提供便捷的交通、舒适的住宿、多样的餐饮选择以及优质的文创消费体验,满足衣食住行等实际需求;四是追求优美宜人的景色,期待在遗址公园欣赏到让人印象深刻的壮丽景观。

由此,在对核心遗产价值进行转化的过程中,既要满足当地政府从区域发展宏观层面对于遗址保护传承、区域经济发展、打造城市名片和

改善民生等诸多诉求,也要观照社区群体期望参与园区建设运营、增加就业机会、美化生态环境等需求,还要满足外地游客丰富个人文化体验、享受优质的衣食住行服务的具体诉求。

(二)转化路径:原生与次生相结合

1. 原生路径:构建具有文明重现性的空间表达体系

所谓原生路径,即依托遗址本体及其周边环境,将抽象的核心遗产价值转化为具象化的空间场景。该路径的关键在于根据阐释转译后的内容,对遗址及其周边环境进行复原性展示,构建具有文明重现性的空间表达,使公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古代中国厚重的历史与伟大的成就。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基于VR(虚拟现实)和AR(增强现实)的数字技术是实现这一路径的关键抓手。依托这些前沿技术,可以极大地拓展遗址的场景表达自由度,为公众提供一种沉浸式、互动式的历史空间。

一方面,VR技术可以实现数字化的历史场景重现与互动。VR技术可以弥补大遗址观赏性较差的先天不足,能够在虚拟空间内重现早已消逝的历史场景。无论是史前时期渔猎耕作的生产生活场景,还是历史时期的精美建筑、都城规划以及重大历史事件,VR技术都可以在不破坏遗址原真性的基础上进行虚拟重现。VR技术还具有较强的互动性,可以在虚拟场景的动态营建过程中引导公众参与互动,大大提升了观众对遗址的沉浸感与体验感。另一方面,AR技术可以在真实世界上叠加虚拟信息,推动虚拟与现实的深度融合。受众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AR眼镜等设备对准遗址本体,终端上便会叠加出建筑三维模型、考古动态演示、人物典故介绍内容,从而为平面化的遗址赋予立体化的信息层次。同时,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作为历史场景再现的重要空间构成,AR技术还能在遗址周边环境上叠加出古代地理气候与风光景色的复原效果,营造出契合古代文明的意境氛围。

2. 次生路径:打造具有人址连接性的文化体验

次生路径以核心遗产价值的阐释内容为内核,脱离遗址本体的物理限制,通过服务场景创

新、体验形式升级、文化载体延伸,构建出可感知、可参与、可产生共鸣的人址连接通道。其核心目标是让公众从被动观看转向主动融入,在满足多元主体诉求的基础上,实现核心遗产价值的生活化渗透与长效传播。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实践:一是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体验活动,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例如,借助重要节日举办带有遗址文化特征的庆典活动;模拟考古现场,让公众有机会体验考古发掘的非凡魅力。二是结合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的关键元素,开发特色文创产品,完善各项配套服务。一方面可通过设计遗址主题旅游线路、制作融入器物造型或纹饰符号的特色纪念品和日常用品,满足游客的文化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可通过提供衣食住行的配套服务,如仿照古法饮食的特色餐饮、模拟古代场景的换装跟拍体验、以穿越为主题的亲子酒店等,配合园区的景观设计不断强化所营造的历史氛围感。三是加强遗址公园的社会教育功能,围绕阐释成果开设科普展览、组织青少年研学活动、举办学术论坛,让公众深入了解遗址的多重核心遗产价值,激发他们对古代文明的兴趣与共鸣。次生路径所带来的文化体验不仅有助于推动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还能为周边区域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最终反哺遗址保护的资金需求。

结 语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立园之本,是为了更好地将古代遗址展现在公众面前。因而,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的实现其实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传递流程:第一步是对核心遗产价值的提炼,即锁定本源意象。通过梳理遗址所拥有的多重核心价值要素,按照科学合理的标准锁定其最重要的部分,寻找到内在的逻辑关系并进行整合,进而得出一个高度凝练的概念。第二步是对提炼结果的阐释,即重塑核心遗产价值。对提炼出的本源意象进行通俗的解释和适当的发挥,讲清楚其前因后果,将专业的研究成果重塑为共享的文化知识。第三步是阐释成果的转化,即呈现核心遗产价值。将转译

后的内容用多种渠道和方式转变为具有文明重现性的空间表达与具有人址链接性的文化体验。其中,提炼是对核心价值的高度概括,阐释是价值传递的关键步骤,转化是价值表达的最终形态。三者层层递进,关联紧密,形成动态反馈的有机整体:遗址贡献了真实的核心遗产价值,提炼对要素信息进行了筛选凝练,阐释则赋予了转化的具体内容,转化又从物理与精神双重层面为公众提供了深度体验。三者共同构成了层层传递的内在逻辑架构,实现了从遗址到公众的价值传递,最终使遗址公园成为一个既能融入城市生活又能与公众精神世界相连的活态文化空间。

注释

①总体来说,国内对考古遗址公园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考古遗址公园的基本概念、类型及其功能等方面。张忠培、单

霁翔、杜金鹏、王新文、王刃馥、王京传等学者围绕其定义、分类以及规划与建设展开了深入探讨,逐步构建起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随着实践的不断推进,学术界逐渐将目光转向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展示与利用等问题。②③孙华:《遗产价值的若干问题——遗产价值的本质、属性、结构、类型和评价》,《中国文化遗产》2019年第1期。④⑤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页,第382页。⑥陈平:《李格尔与艺术科学》,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352页。⑦参见孙华:《遗产价值的若干问题——遗产价值的本质、属性、结构、类型和评价》,《中国文化遗产》2019年第1期;余佳:《文化遗产价值探讨》,《科协论坛》2011年第3期;陈耀华、刘强:《中国自然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及保护利用》,《地理研究》2012年第6期。⑧高小燕:《公共考古视域下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⑨陶力:《从“学术空间”到“公共空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价值传递的实践逻辑》,《遗产》2025年第1期。

On the Extraction,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ore Heritage Values of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s

Zhang Dongning

Abstract: The heritage value of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core and derivative heritage value. The core heritage value, composed of elements such as chronological age, histo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rt, plays a dominant role in shaping the derivative value. It originates from the site itself and is refined over time, with its establishment based on human subjective cognition of the site. In contrast, the derivative heritage value includes elements such as commemoration, economy,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 representing the objective impac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ite and the park on people's material and spiritual lives.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s is to facilitate the transmission of core heritage value from the site to the public. This transmission process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first, extracting the core heritage value by establishing scientific standards to identify and integrate these key elements, thereby defining its original imagery an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subsequent interpretation; second, reconstructing the extracted cont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compliance and balance, providing accessible explanations and appropriate elaborations across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ime-space-human," and translating professional research into shared cultural knowledge; finally, taking full account of the different demands of the government, residents, and visitors, and reshaping the interpreted outcomes into spatial expressions focusing on civilization and cultural experiences with human-site connectivity through primary and secondary paths.

Keywords: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s; heritage value system; value transmission process; original imagery

[责任编辑/周舟]